

木刻千年的民俗密码

——探访昭通甲马非遗传承人

通讯员 曹睿周礼琼/文 吴鑫怡/图

在昭通古城的街巷深处,推开一扇木门,吱呀一声,仿佛推开了另一个时空。屋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,案板上整齐摆放着梨木雕版、油墨、宣纸。省级非遗昭通甲马的传承人石梁正俯身案前,手持刻刀,顺着木材纹理缓缓雕琢。“以前,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甲马,婚丧嫁娶、春耕秋收,都要烧一张甲马祈福。”他抬起头笑了笑,“现在年轻人大多不晓得甲马



昭通甲马“平安”拓片。

是什么。”

守正创新:让古老技艺“活”在当下

石梁的甲马拓迹工作室规模不大,定位却很清晰:手工体验、传统雕刻、文创开发。他的理念也很明确:“我更偏向创新路线,但非遗传承从来不是‘丢本求新’。既要守住甲马最传统的工艺精髓,又要契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。”

在石梁看来,甲马承载的“美好祝愿”内核不能丢,但表达方式可以与时俱进。他推出了“发量王者”“马上有福”“来财”等年轻人喜欢的主题系列作品,传统的粗犷线条搭配现代的幽默文案,很受年轻人欢迎。书签、冰箱贴、明信片、装饰画等文创产品,既保留了甲马粗犷质朴的艺术风格,又融入了昭通古城、大山包黑颈鹤等地域元素,深受游客喜爱。

文旅融合:沉浸体验比碎片推广更有效

贵州会馆是昭通古城的一处热门打卡地。“五一”期间,游客在此亲手体验甲马拓印。石梁一边示范一边讲解:“墨不能多,多了容易晕开,也不能少,少了纹路不清晰。宣纸铺上去,用毛刷轻轻压平,再用马莲反复均匀擦拭。”

对于线上宣传,石梁始终保持着理性态度。“像抖音、快手这类平台,很多人刷到就划走了,很难静下心来了解甲马文化。”他更偏向于走进校园,每周带着雕版和宣纸走进中小学,让孩子们亲手拓印一张甲马。“面对面交流、沉浸式体验,远比碎片化的线上推广更有意义。扎根校园,走近年轻人,才能真正让甲马文化深入人心。”

传承之困:千年技艺面临后继乏人

尽管有传承人的坚守,昭通甲马的生存现状依然不容乐观。最让人忧心的是传承的断层——甲马制作从选材、雕刻到拓印,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浮躁。一块巴掌大的雕版,制作耗时短则数日,长则数月,从入门到精通,更是

需要三五年的潜心钻研和苦练。如今,昭通的甲马传承人大多是中老年人,青年传承人寥寥无几。

比起技艺传承,更难的是留住烟火气。大众对甲马的认知度低,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,曾经植根于传统农耕日常的民俗场景逐渐消失。“不少昭通本地人都不知道甲马是啥,更别说外地游客了。”此外,传统甲马是手工制作,耗时长,售价低,手艺人难以维持生计。传统的甲马,年轻人觉得老气、过时。若是过度创新,又怕丢失甲马原本的韵味。

微光引路:坚守传统与创新表达并行

好在困境之下,总有微光引路。在政府的扶持和传承人的坚守下,昭通甲马开始探索“守正传统、创新表达、文旅融合”的发展路径。昭通依托昭通古城,在陕西会馆、贵州会馆、古城非遗街区推出甲马拓印体验、非遗工坊研学等活动,同时积极推进“非遗进校园”活动,邀请传承人走进校园,开设甲马雕刻、拓印课程,培养年轻受众。

天色渐晚,石梁还在工作室里忙碌。案上几张刚拓好的甲马墨迹未干,纹路清晰,线条粗犷。他拿起一张“平安符”看了看,小心地夹进宣纸里。他感慨道:“非遗发展不能只靠情怀,得让它真正‘活’起来。这门手艺,不能在我们这代断了。”

窗外,昭通古城的灯笼次第亮起。刻刀与木头的摩擦声细碎而坚定,像是千年前的回响,也像是向未来的叩问。

在孙逢源的推动下,重修五莲书院成为重要的公共事务。他召集地方士绅邓焘、彭玉田等人共同商议,号召各界人士捐资出力。士绅、百姓纷纷响应,众人各尽所能,迅速筹集修缮所需经费与物资。此次修缮是依旧址重建,并进行了完善。数月之后,五莲书院焕然一新,讲堂、斋舍、门墙、庭院全部恢复,形制较创建之初更为规整。

为保障书院长久运转,孙逢源亲自制定经费制度:“岁给束修银八十两、米十石,由文昌宫租米供给。”也就是说,山长的年俸固定为白银80两、大米10石,经费取自文昌宫公田田租,不向民间摊派,财源稳定,制度清晰。此举为书院的长久办学提供了保障。沉寂已久的莲峰,再度响起读书声。五莲书院的重修,不仅是一座建筑的恢复,还是地方文脉的接续,也是边疆地区历经战乱后重建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。

转型:从书院到学堂,弦歌不辍

重修之后,五莲书院进入稳定发展阶段,一直延续到清末新政改革。这一时期的办学,有几个显著特点:教学以科举为核心,课程以儒家经典为主,重点学习八股文、策论、诗赋;管理较为严格,学生必须按时上课、遵守院规;官绅共同监督,知县、教谕定期视察、主持考试;招生面向普通子弟,但凡有志求学、品行端正之人,皆可入院求学。

在此期间,五莲书院为永善培养出一大批本土人才。他们有的执教兴学,有的入朝从政,有的成为乡贤,积极参与修路、建桥、赈灾、修志等公益事业。书院对地方社会的教化作用日益凸显,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,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清政府颁布新政,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、中、小学堂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科举制度正式废除,传统书院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。五莲书院顺应时代变革,改制为永善县高等小学堂。改制之后,教学内容迎来根本性调整,在保留国文、修身等传统内容的基础上,增设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体操、图画等新课程,教学模式也从传统诵读讲学,逐步转向新式课堂授课。

从清末到民国,书院先后改为永善县高等小学堂、县立小学、中心小学、县立初级中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作为中学继续办学。直到今天,五莲书院旧址仍在原永善第三中学处,只是书院原貌已不复存在,仅能看到一些残缺的建筑物。自1836年兴建至今,近200年里,这片土地一直书声不断。

启示:文脉长存,方为真正力量

五莲书院是永善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第一,它是永善县第一所正规书院,标志着永善自此迈入有组织、有规模、有制度的教育发展阶段;第二,它是边疆文教的典型代表,其兴废与改土归流、社会安定、战乱破坏、秩序重建息息相关,是清代滇东北边疆治理的真实见证;第三,它是由官府倡导、士绅出资,体现了官绅共治的边疆治理模式;第四,它是永善县本土文脉的象征,战火可以烧毁建筑,却无法磨灭崇文向学的精神信念;第五,它是滇东北少有的文脉未曾中断的古书院,近200年弦歌不辍,在云南边疆教育史上极为珍贵。

五莲书院的发展历程,是一段厚重的边地文教史。它兴于治世,毁于战乱,重修于人心思治之时,转型于时代变革之际。一座书院,见证了永善从蒙昧走向开化、从动荡走向安定、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过程。它告诉后人:一个地方真正的力量,不在于城池是否坚固,不在于一时的盛衰,而在于文脉是否长存。如今,虽然五莲书院已不存在,但它的文脉仍是永善最深沉、最持久的文化底气。



金沙江奇石。

在滇东北的苍茫大地上,乌蒙山以雄浑之姿挺立,金沙江以奔腾之势流淌,共同孕育了一片神奇的土地——昭通。昭通的石文化如同一股潜流,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流淌,从根石艺术的萌芽到赏石协会的崛起,昭通石文化在自然与人文的交响中,谱写了一部跨越数十年的艺术传奇。

根石艺术的萌芽:自然之灵与人文之思的碰撞

昭通,这片独特的地质地貌与立体气候交织的土地,宛如一位神奇的雕刻师,雕琢出金沙江石、乌蒙山石等30余种奇石。这些奇石,或温润如玉,似少女娇羞的面庞;或线条刚劲,如勇士坚毅的筋骨;或色彩斑斓,仿佛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。每一块石头,都是大自然的杰作,等待着有缘人发现与欣赏。

20世纪80年代,昭通的根艺与奇石爱好者们,以自然为师,将枯木朽根与奇石相结合,开启了根石艺术的探索之旅。姜青平,这位根艺艺术领域的先驱者,自幼受父亲文玩上雕刻的龙纹启发,痴迷于根艺创作。他不仅自己潜心雕琢,还带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好者一同钻研,形成了早期的根艺创作群体。他们匠心独运,让每一块石头都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本土根艺协会相继成立,并逐步发展为根石艺协会。协会以根艺为主,奇石为辅,吸引了众多人才。他们的作品,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,还在全省、全国各类展出中屡获殊荣,成为昭通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赏石协会的崛起:规范化与组织化的新篇章

进入21世纪,昭通石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。2025年3月12日,昭通市赏石协会正式成立,标志着昭通赏石文化从民间自发迈入规范化、组织化的全新阶段。协会业务范围涵盖赏石文化弘扬、场馆收藏展示、鉴赏展会活动承办及国内外文化交流等,旨在整合行业资源、提升专业水平。

赏石协会不仅填补了本地赏石行业组织化发展的空白,还通过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,推动了昭通石文化的全面发展。协会吸收了根石艺协会的部分成员与资源,搭建起“根艺+赏石”的复合型文化平台。根石艺协会的奇石收藏、展览经验为赏石协会提供了实践支持,而赏石协会专业的鉴赏体系和国际交流能力,也进一步提升了昭通根石艺术的整体水平。

在赏石协会的推动下,昭通石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样。协会积极参与各类区域性赏石交流活动,集中展示昭通金沙江石、乌蒙山石等特色石种,吸引了省内外石友齐聚一堂、交流互动。同时,协会还深入开展“赏石文化下乡”活动,通过现场实物展示等形式,让赏石文化走进乡村、贴近群众,有效提升了昭通赏石文化的影响力。

人文底蕴的滋养: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不竭动力

昭通石文化的繁荣,离不开深厚的人文底蕴。昭通历史悠久,文人名士层出不穷,为石文

自然与人文交响中的艺术传承

昭通石文化

记者 杜恩亮 文/图

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从根石艺协会到赏石协会,一代代石文化传承者坚守匠心、潜心创作,赋予了每一块石头别样的艺术韵味。

姜青平曾言:“兴趣这桩事,是世上最好的东西,从来无迹可寻。”正是这份对石文化的热爱与执着,让昭通石文化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而赏石协会的成立,更是将这份热爱提升到新的高度。协会通过搭建会员交流平台,推动线上分享常态化、线下交流规范化,凝聚起“协会是一家,兴旺靠大家”的发展共识。

在“文化昭通”系列活动中,昭通根石艺作品品类丰富、工艺精良,赢得参观者的一致好评。如今,昭通根石艺精品已走进全国15个省市,远销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,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协会总结出的“美在自然、难在发现、巧在加工、贵在传神”的根石艺术创作精髓,凝聚了昭通石文化传承者多年的实践经验与创作智慧。

产业融合的探索:石文化与地方经济的共赢之路

昭通石文化的兴盛,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与文化交流层面,还在于其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。水富市连续承办中国金沙江奇石艺术博览会,成为金沙江流域奇石集散地。博览会上,各类奇石争奇斗艳,交易额十分可观,展现了昭通奇石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。

昭通市赏石协会在推动产业融合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协会深入挖掘昭通奇石与文旅产业的契合点,积极探索“赏石+乡村旅游”的创新发展模式。通过举办赏石文化节、打造赏石主题旅游线路等方式,将赏石文化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,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。

同时,协会还加强与周边省市赏石协会的合作,推动昭通特色石种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。在第二十四届成都国际赏石文化博览会暨世界石魂展上,昭通市赏石协会参展的两件藏品大放异彩,一件荣获名石奖,另一件斩获金奖。这份亮眼成绩,不仅提升了昭通奇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还为昭通石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昭通奇石,这一自然与人文交织的艺术瑰宝,必将在未来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它承载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蕴含着昭通人民的智慧与匠心。在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程中,昭通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,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。



书法、奇石展。

弦歌不辍五莲峰

通讯员 刘仁普

曾坐落在永善县莲峰镇的五莲书院,是永善县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所书院。从清道光十六年创建到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,它的历史不仅是一所书院的兴衰,还是永善县从边陲荒地向文教渐兴的真实写照,亦是滇东北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。

缘起:改土归流催生文教之需
永善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,位于乌蒙山区深处,东部和北部与四川凉山、宜宾等地相邻,境内山高谷深,河流纵横,地势十分险峻。在古代,这里长期属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,汉代以后虽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管辖范围,但长期处于羁縻统治状态,中央王国的管理较为松散。明代仍以土司管辖为主,汉文化传播范围有限,教育机构稀少,整体教育水平落后。

清雍正年间,朝廷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,废除土司世袭制度,由朝廷直接派遣流官治理,永善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正式设县。改土归流之后,清政府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行政、赋税、治安管理体系,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滇东北一带,屯垦、经商、办学,推动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,儒家文化、礼仪制度、教育理念也随之深入边地。

然而,在乾隆、嘉庆早期,永善县的教育仍然十分薄弱。由于地处偏远,交通闭塞,经济落后,除永善县学宫外,县城内没有正式官办教育机构,乡村地区更是仅有少量义学、私塾。大部分学子只能粗识文字,难以系统学习儒家经典,有志于科举的士子,只能远赴昭通府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求学,极为不便。这种局面,与清政府在边疆推行“教化安边”的政策不相符。

清朝统治者一贯认为,边疆要稳定,必须文教先行,只有兴办学校、传播儒学、培养士人,才能实现长治久安。因此,自乾隆年间开始,云南各地陆续兴办书院、义学、社学,逐步构建起覆盖府、州、县的地方教育体系。道光中期,永善县社会相对稳定,农业生产有所恢复,商业活动逐渐活跃,地方士绅群体日益壮大,建立一所属于本县的书院成为地方官员与士绅的共同愿望。五莲书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。

创建:官倡绅办,边地首座正规书院

五莲书院正式创建于清道光十六年(1836年)。据《续云南通志稿》记载:“永善县五莲书院,道光十六年,知县俞良杰、教谕董齐圣、邑庠生明师训等建。”这一记载明确了3个关键信息:第一,倡建者是知县与教谕,属于官府主导;第二,地方士绅共同出资、出力;第三,这是永善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整、制度规范的书院。

因此,五莲书院属于官倡绅办、官督民助

的办学模式,是清代边疆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书院——既不是完全由官府财政负担的官办书院,也不是纯粹的私人书院,而是官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兴办的公共教育机构。

因莲峰镇境内有一座形似五朵莲花的山峰,状如莲花绽放,书院故而取名“五莲书院”。这一命名既体现了当地的地理特色,又暗含“文人荟萃、高洁清雅”的文化寓意。建成之初,书院建筑包含讲堂、斋舍、大门、二门、围墙、庭院等。讲堂是讲学的核心场所,斋舍供学生自修与住宿,整体布局简洁庄重,符合边地书院务实朴素的风貌。虽然规模不及省城、府城的大型书院,却是永善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建筑工程。

兴盛:开启永善文教先河

书院建成后,主要承担三项功能:一是讲学授课,聘请品行端正、学识渊博的绅士担任山长,讲授古文、诗赋等,为学生备考科举筑牢基础;二是月课考评,每月由知县、教谕等官员主持考试,评阅学生的文章并划定等次,对成绩优异者给予适当奖励,以此激励学生勤勉向学;三是教化乡邻,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,也是传播儒家伦理、礼仪规范、忠孝思想的地方,对改善民风、稳定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从道光十六年到咸丰末年,是五莲书院的第一个兴盛期。县城及周边乡村子弟纷纷前来求学,崇文向学之风日渐浓厚,永善县逐渐出现一批学有所成的生员、贡生,部分人更是由此步入仕途。对于永善这类边地县份而言,五莲书院的兴办,真正开启了地方文教的先河。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:“书院兴,则人才兴;人才兴,则地方兴。”五莲书院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,更是一种文明秩序的建立。

劫难:兵燹之中文脉尽毁

然而,这样平稳发展的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。咸丰、同治年间,云南全境陷入长期战乱,永善也未能幸免。

据地方史料记载,同治元年(1862年)冬,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军攻入滇东北,攻占永善旧县城莲峰。太平军入城后,占据县衙及城内重要建筑,驻守长达两个多月。由于清军与地方团练不断围剿,城内粮草日渐耗尽,太平军无法长期固守。同治二年(1863年)正月初二夜,太平军决定撤离莲峰。撤退之前,他们放火烧毁了整座县城。旧志对此有着沉痛记述:“署属灰烬,民居荡然,祠庙俱毁。”短短12个字,道尽县城被焚毁的惨状。

作为县城内最重要的文化建筑,五莲书院首当其冲,被大火全部烧毁。房屋、典籍、礼器、匾额、碑刻无一幸存,数十年积淀的文脉,一夕之间化为瓦砾。关于书院被毁的原因,《五莲书院》一书中只写了4个字:“毁于兵燹。”短短四字,背后却是一段沉重的历史。

战火过后,书院只剩断壁残垣,院内荒草丛生。教师四散,学生流徙,读书声彻底消失。此后近7年间,五莲书院完全废弃,永善的教育事业陷入停滞。对于文风初兴的边疆县份来说,此番重创几乎是毁灭性的。

重生:人心思治,文脉再续

同治三年(1864年)后,云南东部战乱逐渐平息,朝廷军队逐步控制局势,流亡百姓陆续返乡,县城慢慢恢复生机。但因战乱创伤深重,历任地方官员都以安抚百姓、恢复生产为首要任务,一时无暇顾及书院重建事宜。

直至同治九年(1870年),知县孙逢源到任永善,五莲书院的命运才迎来转机。孙逢源上任后,非常重视文化教育。巡视县城时,他看到五莲书院旧址破败不堪,深感痛心。他对当地的士绅说:“学校者,王政之本,人才之渊藪也。边地文教,尤其紧要。今废弛若此,何以育士而化民?”